

郭战涛 著



民国初年 骈体小说研究

郭战涛 著



民国初年 骈体小说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初年骈体小说研究 / 郭战涛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 - 7 - 5633 - 9854 - 6

I. ①民… II. ①郭… III. ①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I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3209 号

总 监 制:郑纳新

策 划:魏 东

责任编辑:魏 东

装帧设计:赵 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129/139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50mm×960mm 1/16

印张:15.5

字数:200千字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3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序

陈思和

从2002年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聘我为兼职教授(紫江学者),具体的工作中包含了指导若干名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从2002年到2009年,我先后指导了十名青年学者,郭战涛君是其中的一名。郭君原先在内地教书,工作几年后考上华东师大现当代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师从吴俊先生,研究1950年代的文学,成绩斐然。2005年后从我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却转向了连我也不甚熟悉的民国骈体小说领域。民国骈体小说自有历史传承,1912年徐枕亚开始连载《玉梨魂》,遂形成风尚,到1919年以后基本上云消烟散。前后七年,不过是文学史上一个瞬间;又是处于晚清民初与新文化运动的夹缝之间,首当其冲遭遇了新文学倡导者的猛烈批判,因此,骈体小说不仅在文学史上毫无地位,而且在学界也一向寂寞。我奇怪为什么郭君要放弃已经经营有年,而且已经产生了影响的当代文学研究,转向这一冷门领域从头开发新资源。但我也没有与郭君讨论过其中原因,只是尊重他的选择,就同意了。

我之所以同意并支持他去做这样一个与新文学似乎是没有关系的研究课题,完全是从学科发展现状来考虑的。我以前就说过,现代文学作为二级学科本来就有点先天不足,研究古代文学必须通小学,研究外国文学必须精外语,而现代文学的前期准备相对薄弱:现代文学从民国算起不过百年史,少于古代文学的一个断代史,资料准备也相对简单。然而现代文学学科又是在1950年代意识形态建构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政治功利主义的性质严重束缚这个学科的正常发展,人为的阶级斗争意识成了戕害这个学科的致命顽症。

从1980年代开始,现代文学学科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在与这种政治功利主义的性质作斗争,努力使它还原为一个正常的科学的研究领域。作为科学,第一步就是要尊重历史尊重存在,对于曾经存在过,并且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是被人为因素所遮蔽的文学现象,都应该以充分的尊重的态度来重新发现和重新解读,恢复这一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面貌。有的学者认为,现代文学本身是在斗争中产生的代表着“新”意义的文学,所以研究现代文学必须维护这种斗争的合法性。我并不怀疑这种态度的真诚性和纯粹性,但是也必须承认,仅仅以“五四”新文学为唯一合法性的视角,仍然没有摆脱这个学科建构之初的意识形态动机,也不能真正地推动和传承包括五四新文学在内的这个学科的发展。因此我鼓励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尤其是年轻的学者们,应该敢于走出原来画地为牢的学术视域,用更加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知识准备来面对学科的未来,在不断开拓被遮蔽的领域、坚持多元立场的思考和研究中,激活这个学科的生命力。我这几年指导的研究生中,有研究晚清宋诗派创作群体的,有研究都市通俗小说的,有研究古今小说演变的,也有像郭战涛君这样研究骈体小说的,虽然他们的研究好像与新文学没有关系,但是他们的研究工作却是在没有多少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他们靠自己的努力钻研、搜集资料以及真正的兴趣爱好,一步步地开拓出一个以往不为人所关注的领域。尽管他们的研究肯定还存在着许多偏颇、疏漏的地方,也可能他们的研究成果最终被认为意义不大,但是经过研究以后被证明了的结果比不加研究就盲目否定某种文学史现象,要科学一些,也许会更加接近事实真相。

回到郭君的研究成果而言,他并不是简单地做翻案文章,他的研究是认真的,深入的,许多个人见解都是通过具体的研究而获得的,因而也有特别的原创性。举一个例子,为了厘定“骈体小说”的概念,他必须对文学史上所有含骈体文文体的小说作品作一番清理,算出一个比例,来界定何谓“骈体小说”。为此他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数数字,计算骈文在全篇作品的字数比例,并且考察骈文

与全篇作品结构的关系,最后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结论。这种落实到具体句子和字数的考察方法,看似笨拙但纠正了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些很具体的问题。比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游仙窟》作“文近骈俪”的评语,一般也为世所传,被视为古代骈体小说的代表性作品。但郭君则通过具体的字数统计,指出《游仙窟》的骈文占全部小说不足30%,所以称其“文近骈俪”有似不妥,容易让人误认为骈体小说就应该是“通体采用骈文的小说”。进而他又比较了鲁迅在另一篇写于1927年的《〈游仙窟〉序言》中的不同说法,认为鲁迅有意无意地纠正了“文近骈俪”的评语,由此推断鲁迅在出版《中国小说史略》(1923、1924年)时并未读到《游仙窟》,而是在这之后、1927年以前才有了藏抄本。我以为郭君的推断是很大胆的做法,但我还是鼓励年轻学者能够“胆大妄为”一些,对前人的成果作出可能的怀疑和自己的判断。郭君这个研究结论一箭双雕,既指出了鲁迅论断的局限,也纠正了骈体小说是“通体采用骈文的小说”的误解。

郭君还用这样的办法来讨论了民国时期作家孙静庵和雪涛分别对于清代作家曾衍东和青城子作品的改写问题,他通过两组文本的对比,具体计算出后人在改写前人作品中到底删去了哪些内容,又增补了哪些内容,讨论非常具体,从看似琐屑的统计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民国时期的骈体小说作家中,有一部分人难以真正做到游戏文学,他们的紧张心理在具体创作中都被表现出来。这个结论来自于郭君非常具体和细琐的研究,这对于纠正以往学界对骈体小说(包括整个鸳鸯蝴蝶派小说和民国旧派文学)一言而蔽之认为其性质为消遣文学的既定结论是有说服力的,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与郭君在撰写博士论文中取得成绩相配的,是他的大量的阅读文本。为了研究骈体小说,郭君几乎把古代小说中所有含骈文文体的作品都认真阅读了,也阅读了有关骈文研究的论著,这才可能对自己的研究论题有了十分的把握,并且敢于纠正前人的研究成果。

我把“大量阅读”特别地提出来事，就是有感于现在很多研究生撰写论文明显暴露出来阅读量不够的现象。我这几天在德国旅行，有机会与一位驻外的外交官员交谈，他是德语专业出身，并且被国内某高校聘为教授，他在讲学中发现，现在学习德语的研究生（包括博士）几乎没有人能够完整地读完一部德语的长篇小说，也没有人能够如数家珍地背诵德语诗歌，学习德语的人对德国文学相当漠视。他说，现在的高校里，稍微离实用效益远一些的书就没有人读，所以学习德语可以不读德国文学。我回答说，这不奇怪，在上海的某些著名综合大学里自主招生的标准，竟不需要考语文。无非是语文知识不是实用的知识。设有中文系的大学招生可以不考语文，这要比学习德语的专业不学德国文学更要离谱吧。而郭君花了三年时间穷尽古今骈体小说和相关阅读，这些阅读可能以后也丝毫不能给他带来实际的利益。但就是在这些无功利的阅读中，我想郭君自有他能够体会到的读书乐趣，并在这种乐趣中形成他的思想和研究。

郭君的研究成果虽不能说十分完美，但还是道出了人所未道处，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见解。近年来，旧体诗词和文言文写作有重新抬头的趋势，那么这类研究旧体文学得失的论文还会有现实的价值。我希望郭君博士论文的出版能够在这个领域带来一个良好的风气，提倡一些老老实实、认认真真、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的治学风气，提倡大量阅读、爬梳材料，从具体的文本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研究风气，而反对那些理论脱离实际和花里胡哨、华而不实的风气。如果说，这篇论文研究的问题可能是填补文学史上一个小小的空白，那么由这篇论文引伸出来的方法与学风问题，可能要比这篇论文所研究的问题本身更有意义。——这是我再次阅读郭君这篇论文所想到的。

2010年5月9日

写毕于柏林至法兰克福的列车上

目 录

序 论	1
第一章 骈体小说的概念、美学品格和类型	11
第一节 学界对骈体小说的含混态度	11
第二节 骈体小说的概念	19
第三节 骈体小说的美学品格	28
第四节 骈体小说的类型	36
第二章 民国之前的骈体小说	45
第一节 汉魏六朝“小说”中的骈文	45
第二节 唐传奇与宋代罗烨《醉翁谈录》	51
第三节 《剪灯新话》、《剪灯余话》、《国色天香》	60
第四节 《聊斋志异》及清代其他小说	66
第五节 《游仙窟》和《燕山外史》	75
第三章 文体特征	85
第一节 概况	85
第二节 骈文风格与诗化小说文体	92

第三节	用典与对仗	97
第四节	描写、抒情和议论	103
第五节	骈文的叙事方式	108
第六节	骈文与散文的关系	114
第七节	《玉梨魂》和其他长篇小说	119
第四章	题材类型及叙事模式	126
第一节	凄爱苦情	126
第二节	花好月圆	134
第三节	乱世情态	138
第四节	世态人情及文人心态	144
第五节	叙事模式	153
第五章	创作和接受环境	164
第一节	骈文教育与骈文创作	165
第二节	时势逼迫与文人心态	177
第三节	对骈体小说的反驳与批判	192
结 语	204
附录一	孙静庵、雪涛对前人作品的增删	207
附录二	民初骈体小说引发的文学史问题	217
参考文献	228
后 记	235

序 论

一 问题的提出

骈文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文体,这种文体建基于中国文字的独特性之上,由于骈文表现的特殊美感以及骈散相间造成的语言张力,骈体小说形成了自己的美学品格,就语言体式而言,“大量融入骈文”的骈体小说堪称小说世界中最为独特的一种。

骈体小说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小说萌芽期的汉魏时代,其创作历千百年而不断绝,直到清代晚期王韬的小说集《淞隐漫录》中还偶有出现,唐代的《游仙窟》和清代的《燕山外史》等代表性作品在当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自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开始,中国小说史或多或少都要谈到《游仙窟》,它已经成为中国小说史写作无法回避的作品。

按照篇幅、结构、语言、表达方式、流传方式等文体特征,学界一般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分为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和章回体四种,本文所说的骈体小说是以语体为核心在文言小说内部划分出的一个小说子类,并不与上述四种小说文体构成并列关系。在文言小说内部,与纯粹的散体文言小说和诗歌、散文混杂的“诗文小说”相较,骈体小说的语言体式以及由语言体式所形成的美学风格都显示出了独特的风貌,故此,有理由在文言小说内部将骈体小说与其他小说类型加以区分,以语言体式 and 美学风格为核心确定骈体小说的文体特征。

对于骈体小说的研究,中国古代小说领域的研究者侧重于作家生平和作品版本的考订,虽然有一些研究者或详或略地针对个案作过语言体式的分析(比如李建国论述《燕山外史》的语言体式),但少有将骈体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小说语体进行整体论证的,骈体小说的美学风格研究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样的研究格局自然不利于对这种汉语写作中独有小说语体的理解。

晚清的“小说界革命”以及辛亥革命后民国的建立都没有中断骈体小说的阅读和创作,相反,自徐枕亚 1912 年 8 月 3 日在《民权报》连载《玉梨魂》开始到 1919 年,民国初年的骈体小说创作形成了一个热潮,这在骈体小说的写作史上属于较为少见的现象。

对于民国初年的骈体小说现象,现代文学领域的研究者关注不多,而且几乎所有涉及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都集中于对徐枕亚《玉梨魂》的分析论述,同时,论述往往将作家生平考证和作品社会伦理意义当做重点。当然,也有少数研究者(比如夏志清和陈平原)对《玉梨魂》的语言体式作过论述,但对这些论述仍然有进一步阐释甚至修正的必要。至今尚未看到把骈体小说当做一种小说文体进行分析的论文或论著,或许现代文学领域的研究者认定骈体小说语言体式和美学风格的分析应该是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工作,而在古代文学研究者方面,出于一种难以解释的原因(或许在这些研究者看来骈体小说的语言体式和美学风格是一个不证自明因而无需烦言的问题?)又没有进行必要的分析,于是就出现了对民国初年的骈体小说现象的浮泛论述甚至忽视。

但是,不重视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将难以准确把握民国初年的文学生态,而在文学史写作方面也会出现一个漏洞。

民国初年骈体小说现象的存在至少对研究者提出了以下无法回避的问题:

第一,民国初年骈体小说与民国之前骈体小说相较是否有自己的特征?虽然骈体小说是一个“古已有之”的小说文体,但是民国初年的骈体小说是对前人作品的重复翻版还是在类型、表现方式等方面形成

了自己的面貌？如果二者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又说明了什么？

第二，民国初年骈体小说创作热潮的成因为何？以往的研究者大多将之归结为袁世凯专制的社会背景，但是，这种“外部”因素是否必然引发骈体小说的写作？在作家创作心理与骈体小说的语言体式、美学风格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关联？此外，当时的骈体小说如何应对社会、政治、文化境遇？是否真如前人所批评的那样在思想内容上游戏消遣、无病呻吟？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又该如何解释《螫妇血》、《冢中妇》一类直面现实的作品？《玉梨魂》导源于作者徐枕亚的切肤之痛，即使在表述上有过于缠绵之嫌，但又怎能讥讽它为“无病呻吟”之作呢？

第三，民国初年骈体小说的存在对于鸳鸯派的定性构成了一种挑战。学界公认徐枕亚为鸳鸯蝴蝶派的祖师（至少会承认徐是鸳鸯派的代表作家），也几乎一致认定鸳鸯蝴蝶派小说属于通俗小说，自然推断出《玉梨魂》属于通俗小说范畴的结论，但是，意象绮丽、语句缠绕、不以情节为重的骈体小说又怎么能说是“通俗”的呢？《玉梨魂》中的许多骈句并无通俗可言，尽管某些骈体小说中的骈文比较浅白，但无法掩盖众多作品中骈文的雅致性质，何况还有诸如《蒸霞妖梦》一类在语言上相当难以理解的作品存在。如此一来，研究者不得不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重新修订鸳鸯派的定义，在鸳鸯派内部作进一步的区分而不是笼统地“一视同仁”，但这样做也潜藏着一种危险——颠覆鸳鸯蝴蝶派的概念；要么将骈体小说逐出鸳鸯派以维护原有概念的一致性，但是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鸳鸯派命名的本意，因为鸳鸯蝴蝶派最初即得名于对徐枕亚等人的骈体小说的戏谑。^①

^① 《民权报》主笔刘铁冷《民初之文坛》（见《永安月报》第93期，1947年2月）中为骈体小说辩护说：“余等之组合，以民权为基础，一时凑合，全无派别，近人号余等为鸳鸯蝴蝶派，只因爱作对句故……当亦为世人所许，不敢侈言倡导也。”平襟亚《“鸳鸯蝴蝶派”命名的故事》中回忆：1920年某日，松江杨了公请客，席间“刘半农认为骈文小说《玉梨魂》就犯了空泛、肉麻、无病呻吟的毛病，该列入‘鸳鸯蝴蝶派’”。参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7月，页180。

对上述问题的解答,都需要在对民国初年的骈体小说做深入的分析与论证之后进行。

学界大多采用“骈文小说”这一概念,笔者在此使用“骈体小说”概念,并非故意标新立异。首先,清代“骈文”、“骈体”概念出现后,二者并用,在内涵与外延方面并无区别,属于异词而同意,也即二者实际上通用;其次,此前的研究者使用“骈文小说”有时指称并不具有独立小说体式意义的文言小说作品,而笔者想要强调的是,骈体小说是中国文言小说中的一个子类,应该与仅只掺杂零星骈文的散体文言小说区别对待,所以使用“骈体小说”这一概念以凸现其文体意义;第三,前此已有学者使用“骈体小说”的概念,譬如李剑国论述《游仙窟》时说:“《游仙窟》则以骈体小说的鲜明特征,表明了辞赋——文人赋和俗赋——对于唐传奇形成的重要影响作用。”^①他在论述《燕山外史》时也说它“是典型的骈体小说”^②,所以“骈体小说”并非笔者生造的一个概念。

与骈体小说概念有关的还有“骈俪小说”,这个概念最迟出现于1919年,在《小说新报》第五年(1919)第十期厚生的小说《蒸霞妖梦》之后,有编辑许指严的一则说明,全文如下:“骈俪小说,除《燕山外史》,鲜步其尘。此篇虽未臻流丽工稳,顾亦自标一格。特删节存之,用谗嗜者。指严识。”从许指严的说明中可以看出,他所称的“骈俪小说”指的是骈文比例非常大的小说,比如《燕山外史》和《蒸霞妖梦》,而不把骈文比例相对不大的小说如《玉梨魂》等视为“骈俪小说”,因为像《玉梨魂》的骈文比例在当时的小说中并不少见,作为作家和编辑的许指严不可能无视这些作品的存在而说出“骈俪小说,除《燕山外史》,鲜步其尘”的话。由此可见,后来所说的“骈体小说”和1919年前后所说的“骈俪小说”这两个概念并不

^① 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前言》,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页35。

^② 李剑国:《古碑斗笥录——李剑国自选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页415。

完全相合,“骈俪小说”只是指称“骈体小说”中骈文比例相对较高的那部分作品。

二 研究现状

中华民国二年(1912)8月3日《民权报》开始连载徐枕亚的《玉梨魂》,引起极大轰动,随后《玉梨魂》单行本问世,一时洛阳纸贵,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畅销书。之后,以《小说丛报》、《小说新报》、《民权素》、《小说旬报》等多家报刊为中心,一批被后人称为骈体小说(或骈文小说)的作品相继问世,形成一时风尚。但是好景不长,仅仅七年之后,这种在中国小说史上都堪称独特的小说创作潮流竟然烟消云散了。

与中国小说一千余年的历史相比,七年,如果单单考虑时间跨度的话,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1912—1919年的七年恰恰是中国小说转型的重要阶段,在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和“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间隙出现骈体小说的创作热潮,这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

对骈体小说的批评从无中断,即使在骈体小说最为兴盛的1914—1916年也不乏否定的声音,1915年1月《小说海》创刊号中就有“今世科学盛行,国文之用,日趋简便,绮靡诡譎,无所用之。浸假治小说而从事餽钉獭祭,甚无谓也”的说法,其中暗含着对骈体小说的批评。周瘦鹃《闲话〈礼拜六〉》中否认自己属于鸳鸯蝴蝶派,而断定“至于鸳鸯蝴蝶派和写四六句的骈俪文章的,那是以《玉梨魂》出名的徐枕亚一派,《礼拜六》派倒是写不来的”^①。中国大陆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对“鸳鸯蝴蝶派”持否定批判态度,进而否定骈体小说。1980年代中后期,逐渐有研究者对鸳鸯

^① 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页182。

蝴蝶派作正面研究,肯定鸳鸯蝴蝶派在表现市民社会方面的意义,但是对于骈体小说则并无多少好感,比如对于《玉梨魂》,就一方面肯定它在批判封建婚姻制度上的进步性,肯定它宣扬人性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则几乎无一例外地否定它的语言表述方式,否定它的做作与柔靡文风。杨义在论述民初小说时将包天笑、周瘦鹃与徐枕亚、李定夷的小说文体分别命名为“史汉支派”和“骈文支派”,“骈文支派比起史汉支派,文风更为柔靡俗艳,更多矫揉造作和滥调陈言,因此他们把鸳鸯蝴蝶派的弱点显露得更为淋漓尽致,以致史汉支派不愿和不屑于与他们相提并论”。^① 范伯群认为《玉梨魂》用骈文写作,属于“陈腔滥调的文字游戏”,“读《玉梨魂》最令人反感的是矫揉造作”^②。1990年代以后,研究者逐渐从语言体式的角度关注《玉梨魂》和骈体小说,出现了一些正面肯定的声音。袁进认为:“历史地看,《玉梨魂》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简要分析了《玉梨魂》的骈文特征,“《玉梨魂》是一部骈文小说,从语言上讲并不通俗。不过从骈文的要求来看,它又是骈散结合,所用的典故也大大减少。它适合那些能阅读文言文的一般读者”。^③ 陈平原以一贯对小说文体的重视态度深入民国初年的骈体小说文体内部进行分析:“民初的骈文小说不像《燕山外史》老是骈四偈六,而是把古文的对话、叙述段落和骈文的描写、抒情段落搭配起来,交叉使用,显得错落有致,文体因而较有张力”,而且认为“在小说中,让情节退到次要的地位,突出表现技巧和文学语言,这无疑是一种十分大胆的尝试”,他还认为五四作家对骈文小说的批判,“不只是指其思想内容的陈腐,更针对其堆砌辞藻、卖弄典故、刻意对仗和无病呻吟,而这些正是五四作家所要推翻的封建旧文学的典型特征”,因此判定民国初年的骈文小说是一次

①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页49。

② 范伯群:《礼拜六的蝴蝶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6月,页114。

③ 袁进:《鸳鸯蝴蝶派》,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8月,页45、44。

“悲壮的失败”。^① 陈平原的分析显得更为学术化,但其论述也并非完全没有可以商榷的地方。

海外学者中,夏志清的《〈玉梨魂〉新论》^②认定《玉梨魂》是中国“感伤—抒情”传统的最终发展,并指出:“徐枕亚的艺术本能,导使他把这故事写成中国的歌德式阴森小说,以烘托出过度讲究礼仪道德的社会所呈现的病态面”,显示了一位优秀学者的学术眼光。关于《玉梨魂》中的骈文,夏志清认为:“他的骈文风格,与庾信相较,似嫌俚俗;就连陈球的《燕山外史》(1810)——民国前唯一以骈文写成的长篇小说——风格亦似比徐枕亚‘纯正’。然而,陈球只是运用骈四俪六句子的各种组合,而徐枕亚在风格上较具弹性,采用骈文与古文的穿插交替法,也就是说,把规格严谨而侧重描写及抒情的骈文段落,与较松弛而可用古文表达的对白、叙述段落,交替穿插出现。”判定《燕山外史》“只是运用骈四俪六句子的各种组合”并不符合《燕山外史》的语言体式实际,而将《玉梨魂》在使用骈文语言时的创造性仅仅确定为“采用骈文与古文的穿插交替法”也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赵孝萱的《“鸳鸯蝴蝶派”新论》^③认为清末民初文言小说的骈俪化(赵孝萱用“骈丽化”)成因有二,一是“清代中叶骈文的盛行以及魏晋文风的大炽”,二是“与清末民初文人骋才的风气有关”,追溯其产生的文学史背景,论述有一定深度,不过赵孝萱是在骈俪化现象的层面而非在骈体小说作为一种特定小说体式的文体层面讨论这一问题,所以对骈体小说的文体特征言之不详。

总的来说,对民初骈体小说的研究大多将之置于“鸳鸯蝴蝶派”背景中作社会、文化意义的分析,少数学者的论述中涉及骈体小说的文体问题,不过并不是针对语言体式的专题性研究。

①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页190、191、192、189。

② 《联合文学》1985年第12期,页21、11。

③ 赵孝萱:《“鸳鸯蝴蝶派”新论》,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

同样,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骈文的研究成果颇丰,而对骈体小说的研究基本局限于对单一作品的版本考证和主题、人物形象分析,缺乏在小说文体的层面上对骈体小说语言体式的系统论述。

三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研究民国初年的骈体小说,不能仅仅将眼光局限于民国初年,只有在整个中国小说史的背景下作贯通式的考察,考察骈体小说古今演变的轨迹,在此基础上才能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同时,研究民国初年的骈体小说,如果仅仅局限于对作家作品的社会伦理学分析,恐难显现骈体小说自身的特征,因此也无法真正理解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只有在对骈体小说作出“内部”研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民国初年的骈体小说现象作出有说服力的论述。

本论文主要采用文献学、文本发生学的研究方法。对于中国古代骈体小说的“经典”文本,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进行分析,考察其中的骈文功能、比例及其承担的功能;对于民国初年的骈体小说,则主要以鸳鸯蝴蝶派的代表性报刊为资料来源,力争全面搜集其时骈体小说的文本和作家创作有关状况的资料,兼及单行本个案,在尽可能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论述民国初年骈体小说的文体特征与创作、接受环境。

我们可以在汉魏六朝的笔记小说这种“前小说”(或称中国小说的萌芽状态)中找到骈体小说的远祖。比如汉代刘歆的《西京杂记》卷三《淮南与方士俱去》:“又说:淮南王好术士,方士皆以术见,遂有画地成江河,撮土为山岩,嘘吸为寒暑,喷嗽为云雾。王亦卒与诸方士俱去。”^①全文45字,骈句20字,骈文占全文的44.4%,且承

^① 王根林、黄益元、曹光甫校点:《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页94、99。